

香港 · 城市 · 想像

張少強
梁啟智
陳嘉銘
主編

匯智出版



香港·城市·想像

張少強

梁啟智

陳嘉銘

主編

匯智出版

責任編輯：羅國洪

封面設計：張錦良

香港·城市·想像

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 主編

出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赫德道2A首邦行8樓803室

電話：2390 0605 傳真：2142 3161

網址：<http://www.ip.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次：2014年11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8-12995-5-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輯委員會

張少強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質性社會研究中心總監

馬傑偉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呂大樂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

吳俊雄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作者簡介

伍鳳嫦，現任教於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她的研究範圍包括香港圍村、性別及發展研究、移民及散居研究。現已出版的著作可見學術期刊《*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及研究學部主任。主要研究興趣為新聞學、政治傳播、傳媒與社會運動等。著作包括《*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Mass Protes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Francis L. F. Lee & Joseph M. Chan, 2011, New York: Routledge）和《*Media and Politics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Joseph M. Chan & Francis L. F. Lee, eds., 2008, London: Routledge）。他現時亦是學術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及《*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的副編輯。

周佩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研究興趣包括視覺文化研究、影視研究及文化創意產業。

張少強，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質性社會研究中心總監，網絡書籍《香港社會文化系列》編輯，主力從事香港研究，現已或快將出版的個人論文可見於學術期刊《本土論述》、《社會學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香港社會科學學報》、《*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position*》、《*The China Quarterly*》，近期主要編著有《香港·論述·傳媒》（201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China's Rise to Power*》（2012，New York: Palgrave）、《*Gender and Community under British Colonialism*》（2012，New York: Routledge）。

梁啓智，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領袖課程副主任，研究範疇包括城市研究、科技與社會、華人離散社群、全球化與國際發展。除了學術研究，他對社區參與同樣有強烈興趣，特別是不同類型的本土城市抗爭。他亦有在《明報》發表專欄文章，並曾在香港商業電台擔任客席主持。

陳智傑，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現為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風險傳播、新聞學及媒介社會學。近作有：「香港身分與中國論述的互動：曾蔭權年代的香港本土意識」，羅金義、鄭宇碩（編），2013，《留給梁振英的棋局：通析曾蔭權時代》，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建構媒體範例：香港塌樹事故的新聞論述」，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編），2013，《香港·論述·媒體》，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時事評論則見於《明報》、《香港經濟日報》、《信報》、NOW TV、香港電台節目。

陳嘉銘，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講師，研究範疇包括香港電影合拍片，亞洲電影發展，電影現象、歷史與美學，流行文化，以及動物與城市論述。近作有「香港電影未死：簡論香港電影專才的跨國滲透與文化互動」（收於《今天》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輯）、「開放與局限：中港合拍影片的過去與今天」（收於《香港·論述·媒體》）。

鄧鍵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公共論述、政治傳播、社交媒體。

駱穎佳，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通識及文化研究課程）講師，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哲學博士，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哲學碩士，英國高雲地利大學傳播及文化研究學士。研究興趣：當代法國哲學、文化研究、身體/情動（affect）理論及當代歐陸哲學的宗教向度。近作有「《作死不離3兄弟》：生存作為一種美學！」，尹德成、羅雅駿、林澤榮（編），2014，《光影中的人生與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後現代拜物教：消費文化的神學批判》(2010，香港：FES Press)。

鄭智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英國劍橋大學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近代東亞史、軍事史，以及香港軍事史，現已或快將出版的個人論文可見學術期刊《*Modern Asian Studies*》、《*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國史館館刊》，個人或合著書籍有《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2013，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2014，香港：三聯書店)，以及《*Eastern Fortress: A Mili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201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導言：臨界之都

張少強

香港是一個城市，已在認知上廣被看作必然的事實，儼如在此自我定位以外，無以說出香港為何物。這就普遍令人忽略了城市所包含的環境追求、聚落體制及空間擴展，在在都有重大的人為變遷及競逐過程，對於集體存在方式、政治經濟運作及生活文化實踐，莫不起着決定作用。其結果就是阻塞了香港對於自身城市特質應有的充分反省，導致從內到外，絕大部分香港定位都以城市想像作為起點，好像基因那般支配了香港的神經系統、外形特徵及面貌發展。時至今天，這種自我定位已起重大變動，並在新的格局之中，因應上上下下不同力量，各以自己的地緣取向及形勢評估，正在成為重新界定香港的複雜議題（羅永生，2007；陳智遠、李祖喬，2008；梁啟智，2008）。雖然這種自我定位的一大主流還在期望香港可以繼續活力充沛，總在全球城市體系中，走在國家、區域，甚或世界之前列，可是實情卻是香港根本難再延續昔日優勢，現有局面頹然離析，未來方向無可把握，當下處境在不同的自我追求之上，都是一個「臨界之都」多於一個「動感之都」。

是項《香港·城市·想像》學術出版計劃，承蒙香港樹仁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南中國研究計劃贊助，特此鳴謝。

作為一個城市，香港歷來都以保持發展為理所當然的整體追求，對外開放為勢在必行的自我方針。故此，香港有頗長時間，以Lefebvre (1992) 的理論用語來說，對於「空間的生產」並無不以為然，倒是接受，或是實難抵抗；外來強勢體制及文化在內部拓荒墾殖，從政策到環境，摧毀自然山川，排擠鄉郊村落，破壞社區生活，造就金權為是的城市擴張，以至崇尚士紳化、曼克頓化、迪士尼化，務求市內景觀宏亮，格局耀眼，滿佈盡顯財力的矚目建築，超乎現實的夢幻地景（馬國明，2007）。與此同時，香港極力要跟其他城市角逐區域中心地位及全球排名，利用自己的城市條件及能量壓倒其他城市對手，駕馭境內和境外腹地，以及持續開拓新的腹地。由於這樣的城市個性，香港雖然一直受到中英兩國支配，但也有在夾縫處境以外，發展出更為多元的內外秩序和動態，以及在區域及全球層面之上的城市意識和實踐（Siu & Ku, 2008）。在地緣政治上，香港甚至實為「次帝國者」，總是有意把受殖過程引入的知識技術、組織制度、資本主義、支配方式，化為自己的城市實力，針對周邊狀況，「北進」中國大陸，拓殖鄰近地方，外展自己的城市勢力及發展戰線，力爭領導地位及全球席位（陳清僑，1997）。

為了鞏固帝國在遠東的勢力擴張及貿易利益，英國殖民者佔領香港之初，即在港島沿岸一帶，修築海港，鋪設道路，賣地招商，建立現代政府部門，在這塊殖民地上，着手興建名為「維多利亞」的首座城市，並把市內地段分為「四環九約」作為進行殖民統治的基礎（丁新豹、黃迺錕，1994；鄭寶鴻，2000）。自此之後，香港先被逐步發展成西方在遠東的一個海港城市，並在戰前之時，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1997）的史學

研究所示，屬於亞洲區域內部的網絡中心，所領腹地遍及中國華南及東北，橫跨東亞及東南亞多個地區，兼具移民中途站、貿易中途站及金融中途站的複合作用，專事苦力買賣、轉口貿易及華僑匯款。這些網絡優勢直到戰後，除韓戰禁運時期，都有多邊的，跟不同民族國家、區域體系和西方帝國力量交往的可觀發展，繼而奠定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內的中介角色，進而由貿易至資訊都具有廣泛網絡外展（Meyer，2000），成為一個「超強網絡社會」（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2006：12）。

在政治經濟上成為遠東重要樞紐之同時，殖民時期的城市發展也令香港成為中國內地所要仿效的對象，在生活文化及意識形態上均具有重大的示範作用，在戰前及戰後同樣吸引了一批接一批的離散華人在其市內聚居生活，短期或長期成為英國屬地子民（古學斌，2002）。就連中國近代史中，力主維新的康有為，發動革命的孫中山，都曾到訪香港。這些政治人物往往在香港受到思想衝擊，並借鑑香港經驗作為參考，或兼用香港作為活動基地。早在1879年，康有為受到的思想衝擊就是：「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夷狄視之。」於是，康有為自覺需要「復閱《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康有為，1972：11），並在中國宣揚西學，追求維新。1923年，孫中山自我回顧之時，同樣提及自己早年在香港的日子，認為自己的革命思想緣起「暇時輒閒步市街」，置身香港市面，「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不禁令他認同西方文明之優勝，慨嘆英國可「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成此偉績」，但「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

地如香港者」(孫中山, 1923)。由此可見, 這些城市發展乃是英國殖民者確實能夠「洗腦贏心」(winning hearts and minds)的重要武器, 可令受殖者直接感受並拜服其「文明使命」的實物系統。直到戰後時期, 英國踏入了晚期的殖民統治, 但仍有在戰略部署上, 繼續訴諸城市發展來維持統治地位, 進而抵禦不同反殖運動的權力挑戰, 把政治敏感的殖民統治者身分藏入外表理性的現代城市規管者之內, 權力支配變為追求行政效率的市政事務, 加強控制變為維持市民生活的公共秩序, 把持香港主權變為確保城市安全及活力(羅永生, 1997; 金佩璋, 2013)。

由於香港位處亞洲海陸要津, 香港終被捲入世界大戰之中, 城市內部和外部同遭軍事破壞, 整體發展嚴重受挫(鄺智文、蔡耀倫, 2013)。下及熱戰的硝煙終告消散, 可是全球冷戰繼之而起。鑑於在戰略上需要在中國保留立足點, 在遠東能有海外影響力, 在全球延續帝國餘暉, 英國曾考慮在其殖民統治之下, 進一步把香港變為一個附屬其全球英聯邦體系的城市國家。透過第二十一任港督楊慕琦(1941-1947)提出的政改方案, 在香港市內引入由選舉誕生的市議會制度, 並公開宣告: 「英王陛下政府考慮在香港採取一種能使居民在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中承擔更多責任的辦法」, 「將政府的一些重要職能移交給它」(張連興, 2007: 264)。雖則此項政改方案最後不了了之, 可是香港卻意外地吸納了大量逃出大陸共產主義統治的工業資本及勞動人口, 造就了香港可在戰後時期進而成為一個工業城市(吳仲賢, 1997)。儘管香港的工業發展已被指出是一種「沒有組織的工業主義」(unorganized industrialism)(Chiu & Lui, 1995), 可是香港卻在宣傳上被譽為當代經濟奇蹟, 列入

亞洲四小龍之一，大眾內部因工業蓬勃，同在紡織世界中經歷「千針萬線」的集體生活故事，有血有淚的相互認同（蔡寶瓊，2008）。

透過戰後歷任港督推出不同的城市工程，如：修築水塘、拓展電力網絡、完善交通系統、開發新界土地、發展新市鎮、興建公共房屋等，英國殖民者不僅旨在保持香港城市安全及城市發展，而且刻意借冷戰局勢，跟美國聯手抵抗親共民族主義及左翼思想，把這個城市吹捧為資本主義樂土，國內難民天堂（于群、程舒偉，1997），利用城市生活水平來換取港人民心，作為跟中國談判香港前途的政治籌碼（呂大樂，2011）。面對香港內部的社會衝擊，好像1956年右派發動的雙十事件，1966年蘇守忠激起的反天星小輪加價，1967年反殖色彩極濃的左派行動，英國殖民者則一律視作騷亂，因恢復正常秩序之名，並以警察為主討逆戡亂，肅清反殖勢力，藉此保持事件屬於民事層面的維持城市治安而不是敏感的軍事或政治鎮壓（何家騏、朱耀光，2011；張少強，2013）。冷戰時期，香港亦有在左右兩股政治力量之外，也在國族對殖民的張力之外，從流行文化的電視劇集到官方及民間的社區活動，直接或間接宣揚以城市生活為焦點的本土意識（Baker，2003）。代表自我的主要地標，從明信片到圖片集，則為香港維多利亞港兩旁的繁盛城市景觀；人們並把這塊地標高舉，幾近圖騰那般反覆膜拜，使得本土認同長期在意識形態上都以中環價值為軸心。到了中英兩國正式談判香港主權問題，英國殖民者亦曾再度訴諸議會選舉來抗衡中共的一黨專政，從區議會到立法局（現稱立法會）都先後增加直選議席，直至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1992-1997）提出的政改方案不獲中共接納，仍不惜跟中共交惡，在撤出之前

落實方案 (Ma & Choy, 2003)。

當然這些晚期殖民主義行動不應在理解上單純視為英國殖民者在主動貫徹他們自詡出色的「良好管治」(good government)。正如 Dirks (1992) 所言，殖民主義的發展歷程總包含不同變動、混亂、錯失、意外部分，任何認定殖民主義是有系統的說法都違反歷史實情。若究其實，這些晚期殖民主義行動既有大量為勢所迫的權宜成分，也有來自無法回避的歷史事故及本土政治訴求 (Cheung, 2012a)。不過，港人意識明顯受到單向線性的發展主義控制，因應漁村變城市的「香港故事」，進行自我演敘；因應霓虹璀璨的城市外觀，接受中英兩國在談判期間的官方論述，認同追求「繁榮安定」為香港應有目標；因應冷戰時期的兩極對立，經常以自我本位的城市體制及文化視大陸為他者，總是或明或暗保持「香港—城市—繁榮—自由—資本主義」對「大陸—鄉土—貧窮—極權—社會主義」來想像中港的地緣關係 (Cheung, 2012b)。

今日香港面臨的一大困境就是：由殖民年代遺留下來的城市體制及文化在不同方面都似到了其作用的盡處，失卻扣連社會的統領效力。單向線性的城市發展在香港已確如現有城市社會理論預警那般，勢必無法回頭，最終陷入相反局面，再要發展變成帶來摧毀，繼續向前演進變成壓迫現有體制，保持內增外長變成內耗外損，尋找愈來愈宏大的未來憧憬變成愈來愈超出承受能力的自我改變，因而導致各方力量都苦於未能確實找到新的秩序來跳出這樣的絕域 (critical zone) (Lefebvre, 2003)，但同時在「範式轉移」之下，無法恢復或再以原有方式繼續運作下去 (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 2013)。相反，在此進退失據之間，新的力量總是未能改變舊的體制，局勢亦都

總在轉衰，陷入難以扭轉的內部失衡，大量已被視為當然的事物都可在一下子起變，在盛世亢奮之下看不到的脆弱部分愈來愈迫在眉睫，權力鬥爭愈來愈公然赤裸，社會氣氛愈來愈失控脫軌。中國本想香港繼續作為一個只有利益計算、沒有政治能量的「經濟城市」，並在一國兩制之下，憑靠功利民族主義控制後殖民香港，可是中國以經濟利益作為權力外展的後九七香港政策並無風行草偃之效，反而變成愈演愈烈的城市衝擊，激起愈來愈多躲不過來的生活亂象及社會碎裂。

中國崛起，主權重申，香港本是中國境外的世界城市已然變成一個在其境內的世界城市。特區政府雖然保留香港的全球地位，但其發展策略對香港的定位卻在連番移位。首任特首董建華（2004）先以「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來重找策略位置，把香港定為「亞洲的世界城市」。第二任特首曾蔭權（2007）在尋找「香港新方向」時，已把調子改為香港「既是中國城市，也是世界城市」。可是，現時第三任特首梁振英（2012）仍要再作修改，一面警告香港不可「閉關鎖港」，一面鼓吹「中港融合」為未來大勢。可見在特區政府的官方想像之中，香港要在中國以外作為全球或區域之中的世界城市，不再被列為首要或並行的發展策略追求，中國不再是冷戰時期在香港後面的他者而是權力關係改變之後在香港前面的強者。在城市基建上，特區政府更為着力推動的大型項目再不在於海港發展而是打通中港的港珠澳大橋，務必直入市區的高鐵工程，以至擺脫邊境界線，籌組拉近兩地的東北發展計劃。在政策方針上，特區政府亦愈來愈把整個城市命運押在國內發展之上打賭，憑靠內地經濟力量帶動香港發展。

這些城市重整同時屬於中國加緊控制自不待言。在整體地

緣方向上，「陸地—中國—民族國家—亞洲局面」亦勢將取代「海洋—英國—殖民主權—西方體系」成為決定香港未來的主要力量，令香港沿陸路向內找前途多於取海路對外尋出路。可是，這些城市重整導致了香港內部陷入更為膠着的困擾狀態，帶來更廣泛的集體折騰，多於官方宣稱的「凝聚共識」或「和諧社會」。自鄧小平年代開始，內地經濟改革，開放市場，確有提供香港發展新的出路，但也在1997年之先，已令香港工業大舉北移，使香港的後工業歷程並非一般意義那般，屬於由第三產業帶動的工業升格，倒是在驟然喪失工業之下，急需以第三產業填補，以經濟轉型之名挽救經濟衰退。故此，後工業城市之「後」字在香港實為「沒有工業」之意，經濟生活變得愈來愈單寡，並在政府保持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愈來愈易受傷害，愈來愈多人為競爭（羅金義、李劍明，2004；張少強、崔志暉，即將出版）。下及1997年後，就連電影工業同樣大舉北移，在CEPA政策之下，拔離本土，原是香港本土文化重要部分的港式電影時有認為已死，增進自我身分認同的流行文化似乎急遽流走（陳嘉銘，2013）。

在發展主義之下，香港將消失自身的原有面貌、鄉郊環境和城市歷史；雖然終在反對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清拆之後，喚出了愈來愈具影響力的城市及自然保育意識，甚至有年青一輩提倡農業復耕，但遇有新的項目之時，香港往往也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引發更激烈的爭論，並總在沒有集體認同之下強行推土動工（葉蔭聰，2013）。自由行的龐大消費力帶來了市面暢旺，但也帶來了商品搶購，價格扯高，原有街頭商店格局消失，零售業務轉型，背離本土顧客，觸發D&G事件一類的社區紛爭。大陸生活文化，如使用簡體字、排隊打尖、兒童在公

眾地方便溺等，反覆造成日常層面的中港交惡。內地「水貨客」的聚集，破壞市內社區原有秩序，結果鬧出「光復上水」的自保行動。「新移民」、「雙非嬰」的湧入重新激化冷戰以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族群排斥，並跟階級敵視互為表裏，把可能爭奪資源的下階層大陸來者貶抑為「蝗蟲」，把無法壓倒的上階層來者挖苦做「強國人」（許寶強，2013）。一個歷史上由移民組成的華人社會，兼且仰賴移民才得以發展而成的世界城市，現已對於內地人瀰漫近乎右派的排外主義，香港今後還有平坦的世界都會主義（cosmopolitanism）道路可以繼續走下去嗎？中共在其後冷戰的帝國雄圖上，雖然特意套用了大中華想像來統攝兩岸四地，但它可以完全蓋過這些實實在在於生活世界反覆出現的華人內部直接衝突嗎？

鑑於內地政治經濟威力勢將從人口到體制壓倒本土實踐，香港輿論提出了「核心價值」作為自保心中理想追求的論述依據，縱有列出「自由」、「民主」、「法治」、「廉政」這些關鍵字眼，但總是論述真空，辭令蒼白，在現實政治之中往往無力扭轉局面（羅永生，2013）。特區政府也不時有違「核心價值」，任由自己的管治形象敗壞下去，甚至全以置若罔聞的態度來冷對反對聲音，漠視各方都在不滿的集體躁動。可是，建制力量總是經常在政府內外照樣歸邊護航，親共「愛」字組織則在社區層面直接狙擊對手。引伸所致，香港內在的不同自我訴求均受壓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被強行壓抑之下，可能變為激烈的政治角力，火爆的街頭衝突，甚或相互地有失常理地公然趕絕對方。新舊的民間力量對不同社會運動的抗爭立場也出現嚴重分歧，特別是由反中國化所引發的齟齬最為爭持不下，既令民間抗爭往往相互衝擊，也使得不同立場者常在網絡動員，動輒

以「右膠」或「左膠」互指對方的不是（陳景輝，2013；蕭裕均，2013）。

從本具自信的強勁城市陷入今日的殘局亂狀，「香港正在死亡」成為了新的本土意識。因而，絕望每每化為猛烈的悲憤情緒，變成本土主體對抗權勢的主要引力。當前的政治格局也顯然超出了蔡子強（2002）所描述的「民粹專權政治」，亦不純然好像李立峯及陳韜文（2013）所言那般，由民意之中屬於「聲音響亮的少數」帶動。反而這樣一種既理性也超理性的情緒政治可能更具決定作用。它的強大衝擊在2003年爆發的首次七一大遊行最為顯著，於2012年因應學民思潮竟要在絕境反抗絕境而感召出來的反國教行動也有復現，並於2014年的佔領街頭運動中，化為在催淚煙中跟防暴警察對峙的集體拼死抗命。

由城市議題觸動的自我危機正繼續主導香港，成為後九七香港的一大焦點。今日的城市議題更是涉及多重的歷史堆積，如：殖民遺業、冷戰餘波、發展追求、區域地位、本土認同，兼而包含正在籠罩香港的新近格局，如：地緣位置轉移、經濟結構重整、邊界陸續消失、港式文化流逝、中港矛盾激化、自我價值失守、內部政治倫理崩解。如何介入這個「臨界之都」，對其新邊舊界作出切實判斷，特別是突破想像限制去重新書寫，顯然屬於急切又極大的研究課題，務須要在不同層面，就各自可及的分析範圍，共同作持續探索，並跟現實保持對話。

為求增添可供參考的研究文獻，提供跨學科的研究發現，延續切合時宜的香港研究，本文集以九篇不同的研究論文嘗試作出貢獻，重新檢視香港城市特質，包括尚未熟知的過去部分，以及正在出現的新近部分。九篇論文各自有理論主題和研究實例之同時，也有相互呼應的共同目的和研究旨趣。這就是